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4.09.012

“创二代”创业动机、环境与创业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魏江 权予衡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创二代”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其创业幸福感直接反映了当下我国创业生态和环境的总体水平。以145位“创二代”为样本,探索了创业动机导向、创业环境感知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了创业环境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创业者机会导向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盈利导向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政府环境感知在机会导向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创二代; 幸福感; 创业动机; 创业环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4X(2014)09-1349-09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n “Second 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WEI Jiang QUAN Yuhe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Second 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are the future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y. This study focuses specially on 145 second 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orient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erception on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The study also tes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perception on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to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The empirical study gets several important results. Firstly opportunity-oriented motivation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While profit-oriented motiva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Secondly,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opportunity-oriented motivation to entrepreneurial happiness.

Key words: second 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happines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在中国经济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中存在着大量的创业机会,第一代创业者(“创一代”)通过把握机会、运用资源不仅可以创造企业价值和财富、赢得社会地位和荣誉,也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人生理想^[1]。但大量的媒体报道了“创一代”为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承受了异于平常的风险和责任,有的由于不堪重负,甚至牺牲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创业的结果与创业者期望大相径庭^[2]。那么,目前青年创业者(“创二代”)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如何?关注他们创业的主观效用,分析现阶段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对创业者的影响,有利于揭示中

国社会经济转型对创业动机和创业者发展的影响,也为创业环境的优化提供参考。

无论是在创业研究领域,还是在幸福感研究领域,关注“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是否感到幸福”这一话题的研究都极度缺乏。大部分先前关注创业者主观感受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满意度”的层面^[3,4]。本研究旨在探索研究不同创业动机的青年创业者幸福感水平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创业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

1 文献综述

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首先,对个体效用

收稿日期: 2014-01-15

基金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资助项目(R6110132)

本质的理解对于研究社会经济来说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人们试图描绘和解释客观世界并将其传达给政策制定者的时候。研究创业幸福感是很有价值的,不仅可以从客观的绩效方面理解创业结果,更可以从创业者自身主观效用的角度全面地理解创业的成败^[5]。对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原因和相关因素进行探索并获得发现将补充和完善现有的创业理论,让人们得以更加立体地理解创业人群和创业过程。其次,虽然现有的研究假设外部环境在创业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研究大都将环境因素看作恒定的常量,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创业者动机等内生因素上^[6]。本研究对创业的制度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的,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具有显著不确定的特点,并且会因此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由此,本研究没有将创业的制度环境仅仅看作是外生变量,而是试图探究创业环境与创业者的互动效果,以及其对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青年人的创业行为无疑是国家和地区经济良好运行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他们也是政府制定政策主要考虑的群体。创业者为经济体系引入创新,并可能为经济发展创造价值和贡献^[7]。创业活动对于调整市场以达到更加有竞争力的水平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只是单纯的模仿性创业活动也可以通过刺激市场的效率和促进技术的扩散来推动经济增长^[8]。因而政策制定者也将创业活动摆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来考虑^[9]。青年创业者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群体能否在创业事业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直接影响社会的创业氛围和热情。与老一代的创业者相比,年轻的“创二代”在创业动机、受教育程度、创业技能、环境适应、抗压能力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智能力变化将会导致不同的创业体验^[5,10]。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思想更为自由开放,自我意识更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创业的动机不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新创企业更是寄托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已有研究指出,机会驱动的“主动创业者”的满意度高于生存驱动的“被动创业者”^[11]。然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创业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青年创业者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在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创业者的幸福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故研究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对青年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可以使社会各界,尤其是创业政策制定者

更加了解“创二代”的创业特征和创业需求,从而为其制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索也可以让年轻的创业者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以提升其创业幸福感。

由此,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角度,理解创业者进行创业活动的动力和动机问题、创业中外在的各种环境因素对于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对于进一步发展创业理论,指导创业者本身以及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政策制定者来说都将具有很大的意义和贡献。

2 理论与假设

创业幸福感是指创业者在其创立企业和经营企业过程中对其工作质量、生活品质以及个人成长的主观感受和总体评价。之前的研究发现,创业者比受雇佣的个人有更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但是创业型公司财务投资的回报相对较低^[12],创业者一般的工作时间更长^[13],其面临的工作风险和承受的工作压力会更大。那么,为什么创业者这个职业会被评为最幸福的职业之一,并且自我创业的个人对工作的满意度高于企业员工呢?创业行为中高投入、低回报引致较高的工作幸福感的现象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理性决策和个人单纯的金钱偏好产生了分歧,这让学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获得主观体验的重要性。

KOELLINGER等^[14]为避免创业者行为受到偏向知觉和过度自信的影响,使用直接的方式考察自报告的工作满意度,说明了自我雇佣的创业者表现出“过程效用”^[15]。创业者不仅仅看重结果,同时还看重结果实现的条件和过程。“过程效用”指的是“非财务性”的愉快或不愉快的过程,这与传统标准的经济效用观点不同,经济效用只关心财务性的结果,比如货币收益或者市场交易等。在创业过程中,引起过程效用产生的因素(除了工资收入)包括创业工作本身和创业工作的特性^[16]。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幸福用“幸福感”的概念来表征。目前,心理学中的幸福感研究主要存在两大派别,即“快乐论”与“实现论”^[17]。“快乐论”认为,幸福是指人们经历的积极、愉悦情感的数量和时间的最大化,以及经历消极、痛苦感受的数量和时间的最小化。“实现论”认为,个体感到幸福在于使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和才华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这种个人的自我实现可以使个体功能更加健全,从而带来幸福感。主流研究认为,幸福感可以具体分为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3 种概念取向。主观幸福感认为,幸福主要由对生活的满意、积极的情感体验和较少的消极情感构成^[18]。心理幸福感关注人心理机能的状态,强调个体自我完善、自我潜能实现以及获得成就感,体现了个性化、人格成熟以及成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各项任务,主要的维度包括自我接纳、机能自主、环境掌控、生活目标以及个人成长等^[19]。社会幸福感认为,真正实现幸福在于个人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意义和价值,更关心个体对社会的贡献和融合,它体现了个体与自己、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主要包括的维度有社会整合、社会贡献、社会和谐、社会认同和社会实现^[20]。以上三者概念内涵上相互独立,在心理体验上相互分离,但其内部的结构是紧密相连并相互影响的。本研究在考察创业者的幸福感时,将会从这三者的角度综合考虑,尽量全面地分析问题。

早期的幸福感理论研究重点在于证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景和人口统计项目是如何影响幸福感的。DIENER 等^[18]发现,外在环境只能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化的 15%,更多的解释可能来自个人主观的情感和认知。“期望值理论”认为,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在决定主观幸福感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期望目标的信心时,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目标理论”认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影响个人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生活有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KASSER 等^[21]认为,与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有关的内在价值目标,是天生自然需要和生长需要的表达,比美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对幸福感的意义更大。

具体到创业者这个群体,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创业动机和目的不同,其生活目标、人格成长、获得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往往会因此有所区别。这将导致他们的心理幸福感产生差异。CARREE 等^[2]在其“创业者满意度”的框架中明确提出“创业动机”直接影响创业满意度或通过作用于企业绩效从而影响创业满意度。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早在 2001 年就提出了“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概念,并在

之后几年的报告中不断地完善其内涵和特征。虽然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别,但其并非完全对立。根据两种创业类型的不同特征,本研究将“以实现个人理想、体现个人价值为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试图抓住市场潜在机会的创业者”定义为具有机会动机导向型的创业者;“创业目的仅仅是追求财务绩效和个人财富增加”的,称之为盈利动机导向型的创业者。相比较于盈利动机导向的创业者,机会动机导向创业者更倾向于在创业的过程中把握市场机遇,实现自身理想和目标,而非单纯追求财务回报^[22],所以机会动机导向的创业者在自我接受、自我实现、人格成长、社会认同等方面可能获得更多的成就感,从而主要通过提高其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程度使得其整体的幸福感程度更高。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高低,盈利动机导向的创业者幸福感较低,机会动机导向的创业者幸福感较高。

在新企业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创业者通常须要频繁地与企业、政府、学校等组织和个人进行沟通和谈判。GEM 历年的研究报告也充分地说明了创业环境,包括政府政策、专业基础设施、市场发展程度与社会规范等对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GNYAWALI 等^[23]认为,创业环境是指企业家在实施创业活动及其实现创业愿望的过程中须要面对和能够利用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关于创业环境的构成要素,不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GEM 报告也给出了分析创业环境因素的框架(见表 1)。

表 1 创业环境构成要素

文献	构成要素	数量
BRUNO 等 ^[24]	风险资本可用性、有经验的创业者存在、技能娴熟的劳动力、供应商的可接近性、消费者和新市场的可接近性、政府的干预、周边的大学、土地和设施的可用性、交通便利性、人们的创业态度、支持服务的可用性、人们生活水平	12
GARTNER ^[25]	BRUNO 等 ^[24] 研究中的所有要素,另外加上 5 个要素:人口中近期移民的高比例、较大规模的城市区域、雄厚的工业基础、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工业专业化程度	17
GEM 报告	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支持、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	9
SAXENIAN ^[26]	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密集的社会网络、开放的人才市场、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	4

总结前人研究发现,创业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政府制度环境和市场经营环境。其中,社会文化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并且对

所有个体产生普遍影响。而政府和市场环境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则呈现出动荡和不确定的特点,对这种不确定环境的感知会显著影响“创二代”的创业心理。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中国的青年创业者的不幸福很多是因为政府的政策经常变动。由此,本研究在讨论青年创业者面临的外在环境时,特别关注政府政策以及市场经营情况,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加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结论和建议。

政府和市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构成了青年创业的外部环境。由此,本研究将目光聚焦在青年创业的“政府环境”和“经营环境”上,根据 GEM 报告中描述的创业环境框架,创业政府环境包括政府能够提供的金融支持或补助,政府出台的与创业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政府提供的创业项目,政府对创业的管制,政府的服务流程等。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除了希望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之外,也需要完善的市场经营环境为创业提供保障。本研究将政府环境以外与创业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纳入创业的“经营环境”。同样,根据 GEM 创业环境框架,创业的“经营环境”包括咨询机构、行业协会对创业公司提供帮助,市场的进入壁垒,基础设施对创业公司的支持,市场环境氛围,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

综上,本研究将创业环境分为“政府环境”和“经营环境”两大类进行分析,并依据 GEM 提出的创业环境框架中的调查问题对青年创业者进行考察。

政府对待创业者个人及其企业的态度积极与否影响创业者的工作热情。政府政策偏向性和经营环境的公平性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极大地影响创业结果。MCMULLEN 等^[27]发现政府管制对不同的创业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GOHMANN 等^[28]验证了政府政策会影响资源在生产性创业活动和非生产性创业活动之间的配置。除了政府行为影响之外,创业企业所在行业的经营环境也对新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创业者可以从政府环境中挖掘机会,那么企业的经营环境则是实现这类机会的必要保障。创业者在创业和企业经营的过程中是否与周围环境进行良性互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创业企业是否可以获得优势资源和社会肯定。所以创业者比一般的企业员工更需要社会认同,同时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度也更大。从这一角度来说,社会幸福感是影响创业者整体幸福感的突出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具有不同动机导向的创业者对创业环境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机会动机导向型创业者更加须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对政策和信息的重视程度和敏感程度更高,并期望从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中获得超额利润,实现社会认可。可见,机会动机导向型创业者对政策和制度环境的积极感知可能较大地提升他们的创业幸福感。相对于机会导向的创业者来说,盈利导向的创业者更加关注如何快速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他们在经营上相对保守,并倾向于规避由于环境不确定而带来的风险,对政府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且不会花很大的成本公关以获取政府资源;相反,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获得良好的经营环境保障。盈利动机导向型创业者通常把“金钱”、“利润”放在首要位置,其创业目的并不见得带有崇高的个人追求,有些青年甚至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或养家糊口,因此他们由“实现个人价值”而带来的心理幸福感并不高。据此,本研究之前做出了“盈利动机导向越强,创业幸福感越低”的假设,而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加成熟和包容的创业环境,比如较低的行业进入壁垒,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平的市场竞争,诚实守信的经营氛围等,这些条件客观上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几率,为他们减少困难,使其创业过程更加顺利。由此,本研究假设,在企业经营环境健全的情况下,盈利动机导向对创业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减弱。综上,本研究将从创业环境的角度,考察创业者对其所处的政府环境和经营环境的感知,并分别验证其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中的调节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a 政府环境在机会导向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2b 经营环境在盈利导向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提出本研究创业幸福感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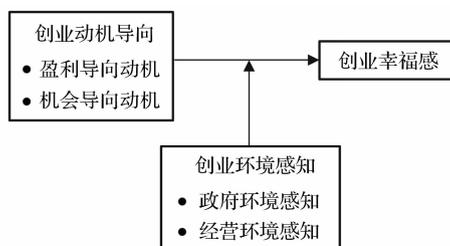


图 1 创业幸福感影响因素基本关系模型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创业者幸福感程度,本研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2012年7~12月间,通过网络、现场和邮件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52份,回收率达到76%。样本人群为浙江省内青年创业者,并通过与浙江省大学生创业联盟的合作,以网络和邮件的形式向其成员发放问卷,同时在大创联盟12期优创班现场进行发放和监督填写,保证问卷的回收效率和填写的完整度。为了提高问卷填写的认真程度,在发放问卷时强调了研究问题对政策制定和社会整体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并承诺对于填写完整度较高的试卷给予反馈和奖励。通过对问卷的筛选整理,排除了7份填写不够完整和认真的问卷,最终共有145份问卷进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过程。

为了考察创业幸福感与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的关系,问卷题项包括创业者对自身整体幸福感的评价以及创业者对个人的创业动机导向和对创业环境的感知态度。在社会人口变量的控制上,让创业者回答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宗教信仰等问题,同时对于创业企业的相关信息如所属行业、成立时间、所属地区等也在问卷中有所体现。

3.2 变量测度

本研究对整体幸福感、盈利导向动机、机会导向动机的测度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采用问卷的形式要求被试对以上各题项进行打分。

根据对现有环境的调研分析,本研究参考GEM的创业环境框架,在几位专家共同研讨之后,调整制定政府环境变量主观感知的测度指标,在问卷中要求被试对创业过程中政策法规(“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优先考虑扶持新成立的和成长型公司”)、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已经转变并已适应市场要求”)、政府信息(“政府部门能提供有价值的创业项目和信息”)、融资服务(“政府在创业企业融资是提供良好服务或补助”)、政府干预(“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5个方面描述的认同程度进行主观打分。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1个因子,即为政府环境感知(见表2)。因子分析中,测度题项的Cronbach's $\alpha=0.745$,大于0.7。

表2 政府环境感知的测度

Cronbach's α	题项	因子载荷
0.745	政策法规	0.568
	政府职能	0.682
	政府信息	0.645
	融资服务	0.732
	政府干预	0.597

注:KMO值为0.70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89.586, $p<0.000$,下同。

本研究对经营环境变量的测量亦参考GEM创业环境框架,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要求被试对当地企业经营环境,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如商标、专利技术等得到保护”)、人身财产保障(“经营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基础设施条件(“可以负担得起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费用”)、技术服务条件(“至少可以在某一领域得到世界水平的技术支持”)、产品出口条件(“当地产品出口服务条件好”)、市场服务条件(“容易得到很好的会计师、律师等服务”)、行业协会帮助(“当地行业协会对新创企业提供帮助”)、诚信社会环境(“当地具有适合企业的诚信的市场环境”)8项指标进行主观评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1个因子,即为经营环境感知(见表3)。测度题项总体的Cronbach's $\alpha=0.929$,大于0.7。

表3 经营环境感知的测度

Cronbach's α	题项	因子载荷
0.929	知识产权保护	0.643
	人身财产保障	0.744
	基础设施条件	0.765
	技术服务条件	0.766
	产品出口条件	0.743
	市场服务条件	0.804
	行业协会帮助	0.765
	诚信社会环境	0.740

注:KMO值为0.869;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44.152。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填写者的年龄范围在20~40岁之间,并有50%以上为25~29岁的青年创业者。参与调查的创业者中86.43%为男性。大部分的被调查者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其中将近80%的被访者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被调查的新创企业中,78.62%为民营企业,其中33.80%为高新技术企业。大部分的被访企业为刚成立的创业企业,95%以上的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5年,且企业规模较小;被调查企业

中不存在上市公司。在行业分布上,新创企业多属于信息软件业(25.52%),其次为文体娱乐业(23.45%),教育行业、批发和零售行业也相对较多。样本特征的分布情况见表 4。

4.2 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为了避免其他因素的影响,选择创业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类男性取值为 1,女性为 2;学历按照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取值分别为 1~5。

表 5 给出了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中,创业者的整体幸福感与机会导向动机、政府环境和经营环境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整体幸福感与盈利导向动机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表 4 样本特征(N=145)

变量	类型	人数	比例/%	变量	类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125	86.21	企业成立年限/年	≤2	115	79.31
	女	20	13.79		3~5	24	16.55
年龄/岁	20~24	22	15.17		>5	6	4.14
	25~29	79	54.48	员工数量/人	1~10	86	59.31
	30~34	30	20.69		11~20	36	24.82
	35~39	14	9.66		21~30	7	4.83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	2.07		31~50	10	6.90
	大专	27	18.62		51~100	5	3.45
	本科	93	64.14		>100	1	0.69
	硕士	21	14.48	行业	文体娱乐业	34	23.45
	博士	1	0.69		信息软件业	37	25.52
个人年收入(2011年)/万	<6	37	25.51		教育	9	6.21
	6~10	42	28.97		批发和零售业	15	10.34
	11~20	31	21.38		其他行业	50	34.48
	21~50	19	13.10				
	51~100	10	6.90				
	>100	6	4.14				

表 5 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整体幸福感	1.000							
2. 性别	0.050	1.000						
3. 年龄	-0.100	-0.488***	1.000					
4. 文化程度	0.133	0.022	0.069	1.000				
5. 盈利导向动机	-0.547***	-0.111	0.101	-0.092	1.000			
6. 机会导向动机	0.794***	0.108	-0.088	0.112	-0.422***	1.000		
7. 政府环境感知	0.853***	0.029	-0.097	0.060	-0.514***	0.539***	1.000	
8. 经营环境感知	0.350***	0.092	-0.147*	-0.061	-0.240***	0.275***	0.288***	1.000

注: *、**、*** 分别表示 $p < 0.10$ 、 $p < 0.01$,下同。

模型 1~模型 4 考察了创业者整体幸福感与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 6)。通过 SPSS 18.0 逐步回归分析,依次有 4 组变量进入模型后,使得 R^2 和 F 值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在模型 2、模型 3 中,盈利导向动机、机会导向动机和政府环境感知 3 个变量在回归分析与总体幸福感的关系最为显著,这 3 个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在模型 2 中,盈利导向动机的回归系数为-0.258,机会导向动机的回归系数为 0.685,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导向型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较高的幸福感,研究再一次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模型 3 中,政府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也显著较高,说明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对政府环境的积极感知对其幸福感具有很强的正向影响作用。在模型 4 中,机会导向与政府环境感知的交互项回归系数高达 0.551,且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政府环境与盈利导向动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较高,说明创业者对政府环境感知积极与否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创业动机与创业经营环境之间的其他 2 个交互

项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表 6 线性回归结果

	因变量为总体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92	-0.080	-0.032	-0.035
年龄	-1.193	-0.055	-0.011	-0.015
文化程度	1.697*	0.039	0.049*	0.046
盈利导向动机		-0.258***	-0.052	-0.328*
机会导向动机		0.685***	0.449***	0.349
政府环境感知			0.566***	0.055
经营环境感知			0.055*	0.213
机会导向×政府环境				0.551**
盈利导向×政府环境				0.316**
机会导向×经营环境				-0.268
盈利导向×经营环境				-0.090
R^2	0.030	0.692	0.893	0.899
Adj- R^2	0.009	0.681	0.888	0.891
R^2	-	0.662	0.201	0.006
F	1.444	62.371***	163.699***	107.664***
F Change	-	60.927	101.328	-56.035

注: ** 表示 $p < 0.05$ 。

4.3 假说讨论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1,即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高低,以金钱为目的的盈利导向动机和创业者幸

幸福感高低呈现负相关；相对地，机会导向动机与创业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以实现个人追求和市场机会为目的的机会导向型创业者更易获得较强的幸福感。

逐步回归模型4验证了创业环境感知对于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环境感知在机会导向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数据结果并未能验证经营环境感知在盈利导向动机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故假设2a得到验证，但假设2b未得到验证。由此可见，政府为创业者提供的良好且稳定的政策、法规，搭建并维护广阔的创业平台，分享创业信息、社会各界对创业活动的认可及积极健康的青年创业氛围可以明显增加那些注重自我价值实现、追求创业梦想的青年创业者的幸福感。

另外，回归分析(模型3)的结果表明，创业者的政府环境感知对创业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大，并且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很强。可见，创业者对创业环境中政府政策的感知积极与否会强烈地影响其创业幸福感，但创业企业经营环境感知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这点原因的解释将在后一部分中详细描述。

综合前文的分析和实证结果，总结创业幸福感、创业动机导向和创业环境感知之间的关系模型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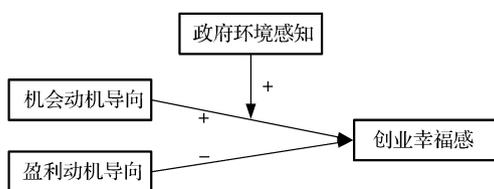


图2 创业幸福感、创业动机导向和创业环境感知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认为，有几个关键因素会影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体验的幸福感。其中，单纯由于想获得更多的财务回报(即具有盈利导向动机)而选择创业的创业者幸福感相对较低，而可以获得政府、投资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支持的、注重实现个人及企业价值实现的(即具有机会导向动机)创业者幸福感较高。青年选择创业事业的时候，应当将自身的理想和兴趣与赚钱的目的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一结果也符合前人在幸福感研究中

的“期望理论”的结论，即“人们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另外，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幸福感也有很大影响。如果当地政府推出有利于创业企业发展的持续而稳定的政策，如对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技术等服务和支持，推出税收优惠政策等，使创业者感知到积极有利的政策环境，尤其是让青年创业者感到政府和社会对他们创业合法性的肯定和认可时，他们的幸福感显著较高。

创业的过程是艰难、曲折并漫长的，良好的创业环境将为青年创业者带来更持续的信心和动力。这一结论将影响幸福感的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验证了良好的外因可以正向调节内因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当个人的动机、目标与期望的可实现有较高符合度的时候，个人的幸福感较高，这也是“期望理论”和“目标理论”的结论之一。故良好的创业制度环境可以使创业者的期望实现得到保证。然而，实证研究并未发现创业者对当地的经营环境感知可以显著影响幸福感水平，具体有以下几点。①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市场服务条件、诚信市场氛围等经营环境在浙江省发展比较成熟健全，属于外部环境中的“保健因素”，保健因素对幸福感的提升相对于激励因素(比如政策机会)来说较小。②青年创业者由于阅历较浅，对于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经营现状并没有较强的话语权，如行业进入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难以他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由此，他们对此类因素以适应为主，而很少想过主动创造条件去改变，对此投入程度低，也因此，青年创业者对经营环境的敏感度较低。③一般来说，盈利动机导向较强的生存型创业者本身对于市场经营环境的要求较低，他们涉足的行业所需的进入成本较低、无须过多依赖行业协会、会计和法律等市场服务，可能也较少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所以“经营环境感知”对提升此类创业者的创业幸福感作用较弱。本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控制了创业者年龄、性别、学历和创业企业所在行业等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创业者创业动机导向和其对创业环境的感知偏向影响创业者的整体幸福感。除以上因素之外，创业者还应注意的，在创业过程中自己为经营和发展企业投入精力和心血，须要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拥有健康和规律的生活方式对

于创业者个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机能和较小的心理压力来说十分重要,这也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幸福感受。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讨论了青年创业者这一社会高度关注的人群在其创立和经营企业过程中,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通过整合创业理论和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理论,提出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将加剧这种影响作用的假设。并通过对145位青年创业者样本的调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创业者的机会导向动机和对政府环境的积极感知会显著提升其创业幸福感。与“创一代”相比,“创二代”创业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当问起“你为何创业”这一问题时,得到的大部分答案都提及了“理想”、“创造”、“改变世界”、“自我价值”这样的字眼。这里引用一名创业者说的话:“没别的,带领我的人不能帮我实现我的理想,那就自己去干,带领和我有同样理想的人,把过程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创二代”们的创业心态更加主动,他们的“机会动机导向”比老一辈的创业者更加强烈,因此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和幸福感更高。另外,“创二代”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创一代”相比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转型经济中政府政策具有不明确、不稳定、不连续的特点,政府职能也在逐步地转变。现在的青年创业者受到政府帮助的机会更多,一个对于企业有利的政策可能促使创业企业的成功,与此同时政策的变动也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并且,目前新兴产业,如互联网、信息技术等蓬勃发展,青年人对此类创业更有兴趣也更有想法,国家制定很多政策的目标人群也是青年人,可以说,政府政策是为他们服务的。由此,“创二代”相比于“创一代”而言,对于创业政府环境因素更加敏感,积极的政府环境感知对于提升其幸福感具有明显作用。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首先,构建并验证了创业者幸福感与创业动机和创业环境感知的关系模型,从创业者主观效用的角度出发描述了创业后果,使用比“满意度”更能直接并准确刻画创业者心理的“幸福感”概念,弥补了现有创业理论的缺口;其次,聚焦于青年创业者心理动机与转型经济中政府环境的互动关系,强调“创二代”作为新生力量的心理动机转变和中国转型经济

情境下创业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刻画了一个新的有研究价值的创业情境。②从实践指导意义来看,本研究的结论可以为立志从事创业活动的青年人或正在为创立公司而努力经营的创业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让这个压力和责任都大于常人的群体更充分地认识自己,了解怎样能在创业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研究发现,创业者对市场机会的预见和把握、发现和利用有利于新创企业的政府政策,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正当竞争会积极地推动创业者的创业理想实现,给创业者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同时,在实地调查中也证实了创业者要注意保持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养成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保持身体活力、调节心理压力也对创业者幸福感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并且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创业者年龄的增长愈发显著。

由于本研究是对创业者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在关键影响因素的选择上有待进一步挖掘、调整和完善。另外,本研究将所有新创企业作为无差别的组织,没有对不同的新创企业及其外部环境进行区分,企业创业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都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从而使创业者获得的创业幸福感有所差异。不同情境的刻画可能来源于外部环境,如行业利润率、竞争程度以及政策多变性等,也可能来源于企业内部,如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管理文化等。在未来的研究中,须要将这些情境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区分和细化不同情境下创业者幸福感的来源和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创业文化氛围浓厚的浙江地区,尽管被访的创业者来自各地,但不足以很好地反映地区间差异,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考证。在未来研究中,还须扩大样本来源,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参 考 文 献

- [1] RINDOVA V, BARRY D, KETCHEN D. Entrepreneurship as Emancip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9, 34(3): 477~491
- [2] CARREE M, VERHEUL I. What Makes Entrepreneurs Happy?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among Founder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y*, 2012, 13(2): 371~387
- [3] KATZ J A. How Satisfied Are the Self-Employed: A Secondary Analysis Approach[J]. *Entrepreneurship*

- Theory and Practice, 1993, 17 (3): 35~50
- [4] THOMPSON C A, KOPELMAN R E, SCHRIES-CHEIM C A. Putting all Eggs in One Basket: A Comparison of Commitment and Satisfaction among Self and Organizationally Employed Me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2, 77 (5): 738~743
- [5] FELDMAN D C, BOLINO M C. Career Patterns of the Self-Employed: Career Motivations and Career Outcome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000, 38 (3): 53~67
- [6] SHANE S, LOCKE E A, COLLINS C J.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3, 13(2): 257~279
- [7] VAN STEL A, CARREE M, THURIK R.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311~321
- [8] KIRZNER I M.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9] AUDRETSCH D, THURIK R.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Managed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0, 10(1/2): 17~34
- [10] BARON R A, TANG J. Entrepreneurs' Social Skill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Mediating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Generali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2): 282~306
- [11] BLOCK J, KOELLINGER P.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cedural Utility[J]. Kyklos, 2009, 62(2): 191~209
- [12] DUNNE T, ROBERTS M J, SAMUELSON L. Patterns of Firm Entry and Exit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9(4): 495~515
- [13] HYYTINEN A, RUUSKANEN O. Time Use of the Self-Employed[J]. Kyklos, 2007, 60(1): 105~122
- [14] KOELLINGER P, MINNITI M, SCHADE C. "I Think I Can, I Think I Can": Over Confid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7, 28(4): 502~527
- [15] FREY B, BENZ M, STUTZER A. Introducing Procedural Utility: Not Only What, But Also How Matters[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04, 160(3): 377~401
- [16] FREY B. Happines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 [17] RYFF C D, SINGER B H, LOVE G D. Positive Health: Connecting Well-Being with Biology [J].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2004, 35(1): 1 383~1 394
- [18]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c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125(2): 276~302
- [19] 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J]. Annual Review Psychology, 2001, 52(1): 141~166
- [20] KEYES C L M. Social Well-Being [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8, 61(2): 121~140
- [21] KASSER T, RYAN R M. Further Examining the American Dream: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Goals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3), 80~87
- [22] BENZ M. Entrepreneurship as a Non-Profit-Seeking Activity [C]. Zurich: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05
- [23] GNYAWALI D, FOGEL D.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4): 43~62
- [24] BRUNO A V, TYEBJEE T T. The Environment for Entrepreneurship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82
- [25] GARTNER W B.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escribing the Phenomenon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5, 10 (4): 696~709
- [26] SAXENIAN A L.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C]. Berkeley: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2000
- [27] MCMULLEN S, BAGBY R, PALICH E. 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2(5): 875~895
- [28] GOHMANN F, HOBBS K, MCCRICKARD M. Economic Freedom and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32(9): 855~874

(编辑 丘斯迈)

通讯作者: 魏江(1970~),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大学(杭州市 310058)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战略管理、高技术服务业。E-mail: weijiang@zju.edu.cn